

# 目 录

## 前 言

### 第一章 中世纪早期：受保障的穷人

- 穷人和布道的传统
- 大转折
- 一个拥挤而动荡的时代
- 穷人以及得到拯救的富人
- 城市：穷人的汇集地
- 在蔑视和同情之间

### 第二章 中世纪晚期：真正的穷人和无益世界的人

- 大鼠疫的冲击
- 凯芒和凯玛娜
- 在流动与流浪之间
- 时代的灾难

- 无业游民
- 乞丐
- 贝壳集团的欺诈行径
- 无益世界的人

### 第三章 摇员—苑世纪 禁闭的尝试 轶缘

- 苑世纪短暂的复兴
- 慈善机构世俗化的趋势
- 在救济与惩治之间
- 路易十四时期的大禁闭
- 总收容所的失败
- 国王的大船 流浪者的苦役

### 第四章 摇启蒙时代的回答 轶园

- 法律法规的狂轰滥炸
- 虚假的和谐
- 乞丐收容所
- 流浪 从博韦到贝阿恩
- 杜尔哥和启蒙思想
- 面对游民 新的描述
- 大革命前夕经久不散的恐惧

### 第五章 摇大革命 第一个福利国家？ 轶缘

- 乞讨 一把无声的锉刀
- 意欲“尊重穷人”的大革命
- 生存的权利 还是工作的权利
- 经受考验的大革命
- 救济 工作的权利还是工作的义务？
- 濒临破产的救济制度

## 第六章 摇 19 世纪 : 在道路的交叉点 轶 园

- 第一帝国 法律的严酷性
- 第一次工业革命 流浪的人民
- 慈善派的回答
- 关于工作权利的论战
- 第二帝国 驱逐这群“流浪的乌合之众”
- 由潜在的乞丐走向劳动者
- 移民、行会手工业者、沿途打短工和到处找工作的人
- 总是“波希米亚人”！
- 农村 对游牧民族和流浪者的呐喊！

## 第七章 摇 20 世纪 : 流浪者虚幻的结局 轶 远

- 在全国范围内享受权利的人
- 两战期间镇压势头的减弱
- 向拒绝苦役迈进
- 大城市流浪者与无家可归者
- “三十年辉煌”时期的穷人
- 统计居无定所者的不可能性？
- 现代反乞讨法令

## 结 论 轶 园

- 持久性
- 新近目光的演变

## 译后记 摇 现实与浪漫的矛盾 轶 缘

## 附 录 摇 大事年表 轶 怨

# 前摇言

穷人、乞丐和流浪者一直以来都吸引着社会的目光。然而在各个时代,这一目光尤其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这一背景中交织着人们的不安甚至焦虑,但在一种真实的慈善之外(不管这种慈善是为了谋求私利,还是出于约定俗成),也交织着真正的互助举动和创造性的时刻。

即使我们想将话题限制在流浪的现象之内,在列提纲时困难已经出现。中世纪的穷人同乞丐、流浪者以及其他放任自己过着一种高度可疑的流浪生活的不幸者之间的分水岭究竟在哪里?因为“真”穷人的高度尊严是毋庸置疑的,在他们身后可能隐藏着基督痛苦的面孔。病人、残疾人或者老人,他们实际上已经融入了社会,而且并没有试图逃脱劳动义务。他们虽受到不幸的打击,但被包容在农村的互助关系里,能够在习惯的地方乞讨。通过扮演使赠予者受益的说情者角色,他们成为了“天堂的守门人”,因此不能将其等同于“假”穷人。“假”穷人是指那些向他们脱离的社会空间非法提出要求的人。

种种原因使然,“假”穷人在“逃离”自己的家乡时也脱离了传

统的互助关系并成为了“无依无靠者”。在中世纪早期,自由民通过“监护人”制度寻找强者的保护,后者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够向他们开放自己的谷仓。对个人而言,一种类似契约的关系向他保证了最小程度的安全,同时也通过不平等的相互服务关系将他置于一种依附的状态。在这种契约关系中,个人因此能够获得“依靠”,即在互益世界范围内受到承认和保护。一旦这一联系断裂,当事人就成为了“居无定所的无依无靠者”,无可挽回地成为了游民。在一个自认为由三个等级和谐构成的社会里,作为真正的社会标尺的体力劳动义务成为了每个地位低下者的必需。拒绝履行这一保障社会“和谐”的义务,不仅表现了下等人对社会一种本质上的反叛,同时还使“和平”受到了威胁。从此,身体健全却四处招摇撞骗的“假”穷人——这些巡游的乞丐、对城市生活一无所知的流浪者——伪装身患疾病和各种残疾,诈取了本该属于“真”穷人的施舍。作为“无益世界的人”,他们还打乱了上帝想要建立的秩序。

如果说这种区别是逐渐确立的,那么大鼠疫的冲击对此起到了推进作用。早在 1349 年,大鼠疫就已将大批游手好闲的“无依无靠者”移交给了刑事法庭。当时,惊人的死亡率引起了劳工奇缺,“好人”让二世在 1348 年签署了一道法令,开启了一条镇压流浪和乞讨之路,结束了 13 世纪末以来的一场演变。身体和四肢俱健全且在巴黎司法官吏管辖区或子爵领地四处游荡的外地“游手好闲者、无赖和凯芒”<sup>①</sup>,必须自谋生路或者在三日之内离开这些地区。从那时起,人们开始不知疲倦地运用这种办法,尽管当时发布了一连串各式各样的敕令、法令和公告,这种办法的主要作

<sup>①</sup> 凯芒和凯玛娜,原文即 精莩社和 精莩菜,中世纪法国对流浪者的一种称呼。——译者注

用却是导致了流浪的产生。“无依无靠者”受到了强迫劳动的威胁，在15世纪，他们甚至以被锁到苦役船上相威胁，不管提出这个主张的是王室还是诸如朗格多克等地的三级会议。同时对居无定所的“价值不大的人”和“没有职业和身份的人”的追捕也日趋加紧。第一个慈善时代过去后，“管制穷人”的时代来临。

尽管镇压机器极其残酷，但镇压的效果很不明显——在惩罚的全副甲冑中，驱逐只是加重了流浪问题——对权力机关命令的反复重申本身就表现了这些命令的无效性。虽然当时乞丐人数大约只占城市人口的1/10，个人的施舍逐渐遭到了当局的反对，人民和有可能犯轻罪的流浪乞丐之间有时存在着摩擦，但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基督教文化一直在抵抗着。某些产业主毫不犹豫地给流连巴黎的流浪者提供住房证明，面对面直接施舍的行为也一直持续着，因为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明天的不确定性使每个小百姓都成为了一个潜在的流浪者。

由于修道院的努力，镇压政策因施舍的定期有规律的分发（这一活动至少导致了穷人的巡游）和济贫院慈善体系的存在而得到缓和。济贫院慈善体系在弗朗索瓦一世统治时期开始世俗化。路易·比维斯在他的《论对穷人的救济》一书中可能第一次从世俗的角度对慈善问题作出了解答。在他所构想的理想社会中，秩序是至高无上的利益，先于穷人应得到的公平。从那时开始，救济制度的改革首先必须考虑到公共利益。由于逗留在大城市尤其是巴黎的流浪者都被迫离开城市，王室为了解决由他们的逃亡引起的流浪问题，在1531年建立了“本地救济”的概念。从此，被驱逐的流浪者必须回到自己的家乡，只要他们是“真”穷人，其家乡就应该给予本该属于他们的救济。

1531年在巴黎、1533年在里昂出现的第一次禁闭的尝试显示

出了这些措施的失败。1561年,当“流浪者、懒汉和凯芒”接到命令要求他们在一星期之内离开,乞丐——这些基督的“真正”穷人则受到邀请重返济贫院。在乞丐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功!当蓬波纳·德·贝利耶夫尔在1576年重新鼓励“大禁闭”政策时,尽管执行了各项措施,尽管有划苦役船的刑罚威胁着累犯,这一禁闭政策还是遭到失败,因为它在向穷人发威的同时也禁止了一种产生乞讨和流浪的贫穷。

在整个16世纪,王室一意孤行。由于虔诚的举动减少,指定给教区教堂的施舍消失,馈赠和遗赠濒于破产,国家只能一味强调一种镇压性的政策。这一政策最终促使了1601年乞丐收容所的建立,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劳改监狱。在杜尔哥任财政总监时期,收容所暂时被取消,之后转移到大革命者手中。大革命以革新的方式承认“穷人对社会有权利”,使得社会在放弃慈善观念的同时具备了现代性。

然而,尽管由拉罗什富科原利昂库尔公爵这一“开明”贵族领导的制宪会议乞讨问题委员会作了许多出色的调查,尽管其他大革命议会继续了这些调查,当局的目标一直是根除乞讨,当然还包括根除流浪的行为。根据执政府和第一帝国时期的法律,乞讨和流浪的行为明确被定义为刑事犯罪。

大革命一直在生存权利、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之间徘徊。在作了一些必要的改动之后,大革命维持了慈善工厂以便向健全的穷人提供工作。如果说它为老弱病残人员组织了公共救济,那么工作的义务也成为了一种必要,尤其是行会制度的废除在它看来排除了劳动市场的所有障碍。当流浪问题进入了越来越复杂的、包括不可告人的政策阴谋和社会恐惧在内的问题体系之后,一直要等到19世纪20年代工作手册被取消——之前没有工作手册就

意味着是个流浪者——失业者的概念才开始出现。这一概念指的是一个被排除于工作之外而非厌恶工作义务或者说工作需要的反叛者。至于乞讨这一轻罪,一直要到 1801 年新刑法典开始实施时它才从法律条款中消失。

虽然几个世纪以来,流浪者——既是地理范围的也是社会范围的——一直持续不断地涌现着,但当事人很少有自发发言的时候。一旦发言,总是在被捕时或在法官面前,受到逼迫和强制,被责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辩解或为某起偷窃事件负责时。他们不仅出现在警方和司法部门的资料中,还出现在其他法律文本中:从王室法令到共和国的法律,从维持公共秩序行动的地方长官的汇报到省长的报告。但是,如果说不管性质如何,这一类型的目光是来自当权者,那么人民大众在同乞丐和流浪者的接触中,有可能通过诸如 1789 年的陈情书或者议会的愿望等表现出在特定背景下产生的态度。有时,由恐惧导致的见证甚至将流浪者描写成了暴乱分子,时刻准备投入象征社会复仇的革命中。不过我们会发现这些例子相当罕见。

如果仅限于这一类型的资料,流浪者的形象似乎显得尤其消极,事实确实如此:他们远没有被当成受害者,却似乎成了引起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强大因素。中世纪的宗教人士、文人、编年史学家,15 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16 世纪的虔诚者,启蒙时期的哲学家,18 世纪的慈善家、社会改革家、医生或者社会学家,他们塑造了一种意义更广泛的形象,不管他们是高声表达了自己的敌意甚至仇恨,还是以自己的意愿呼唤能毁灭流浪源头但又不致使人类尊严受到伤害的改革的到来。

但是,与此同时,某些受到社会承认的传统在当局眼中也有可能成为一种不被容许的流浪。这些传统正表现了区分“无依无

靠者”和被认为已融入社会的人民之间界限的不确定性。在 15 世纪,行会的学徒们醉心于可疑的“出门见世面”的实践——尽管这已成为一种惯例,而十七八世纪,朝圣本身也遭到了怀疑,因为王室和教会一致认为朝圣太容易使人摆脱父母亲的管教和降落在每个人头上应有的社会责任。至于 19 世纪对建造铁路或其他大工程不可或缺的巡游工人,或者那些生活条件艰苦、四处找工作的人,一旦被记入宪兵队的报告,他们也成为了流浪者。

这意味着资料来源的多样性,或者说一些投射在流浪世界的目光的多重性,甚至是复杂性。尤其是这一主题位于政治、经济、社会学、学术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各种资料的交点上。战争、饥荒可能会引起社会痉挛而产生大量的流浪者,同时流行病或者干脆就是贫困——考虑到当时的技术状况、人口的超负荷都可能引起贫困——也是产生社会痉挛的原因。社会变革本身也促使了新的目光的产生。因此,如果说大革命努力铺垫了第一个福利国家的基础,那么在 19 世纪,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将“劳动阶级”视为了犯罪分子,并且理所当然地在这些阶级身上看到了背井离乡、逃离社会控制的“新野蛮人”和“流浪的乌合之众”的形象。

与流浪的历史同时出现的有米歇尔·莫拉或者阿朗·福雷斯特关于穷人的历史,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关于边缘人和无赖的历史,或者路易·舍瓦利耶关于劳动阶级的历史,流浪的历史对每个时代排斥现象的形成提出了质疑。但与此同时,除了描述不属于任何组织的流浪者,这些历史著作通过揭示各个阶级阶层向我们展示了整个社会领域。社会从同情和慈善转向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敌意,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互助的举动。之后,当对流浪者的恐惧在农村经久不散时,超然于流浪者团体之外,也与之没有冲突的启蒙思想家为大革命提供了精神上的武器,这些

精神武器使得人们能够想像一种从慈善中抽离出来的但又不放弃镇压的救济体系。这是一次短暂并遭流产的尝试！因为 19 世纪重新把对流浪者（真正或假设）的控制当作了权利斗争的一项赌注。

最后，在“三十年辉煌”的好时期过去后，我们怎么能够不注意到直至今日的流浪的永恒性？战后缺衣少食、物资匮乏和定量配给的难关被攻克之后，经济增长——尤其是 19 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增长——似乎消除了贫困，此时热情、风趣、充满哲学智慧的大城市流浪者取代了从前的流浪者。然而，继神父皮埃尔于 1839 年寒冷的冬天为无家可归者发出警告的呼喊之后，贫民窟仍然继续在巴黎周围扩张；1845 年，弗雷辛斯基神父建立了第四世界困难援助会。事实上，在“危机”的冲击下——到底是一种“危机”还是一种由全球化速度加快引起的变革，在这里并不重要——新的穷人重新占据了社会空间，并且随着不稳定性和排斥性的加重，居无定所者再次出现。不管他们是定居的——虽然他们名为居无定所者——还是朝着阳光、海滨或者艺术节城市迁移，一个夏天的时间，他们占据了昔日一直遭人厌恶的流浪者的位置。

交通自由和进入城市的自由不容置疑，因此特别受到牵连的城市政府以禁止乞讨作为应对之策，而此时乞讨的行为即将不再受到惩罚。然而，流浪这种未定型的受排斥形式，其历史向我们展示了镇压性解决方案的无效性，即使所谓的反乞讨法令是建立在公共秩序概念的基础上的。同时，我们也认为这一流浪的历史必须以我们当代的忧虑为尺度得到解读。



而,亚眠分衣这一事件宣扬了穷人的高度尊严,因为每个穷人身上都可能藏着基督的面孔,同时也呼吁所有骑马佩剑、拥有财富和力量的强者加入到慈善的行列中来。

## 穷人和布道的传统

基督教的古代历史留给中世纪的,除了穷人的这一形象,还有形象背后的事实。要了解这个事实,必须纵观一系列救济制度。在罗马帝国东部,康斯坦丁于313年颁布法令允许教堂接受遗赠,4世纪和5世纪时他的继任者们将接受遗赠的范围扩大到各种慈善机构。然而,很多穷人迁往大城市,尤其是看到君士坦丁堡有制度性救济措施的保障,他们纷纷涌向了这个城市,于是在313年,统治者采取了限制性措施,开始区别对待健全的乞丐和残废的乞丐:后者可以享受救济;至于前者,无论是真的失业还是受到一直以来的庇护传统影响生性游手好闲,都被赶去当了佃农,如果是奴隶的话,就遣送回他们的主人那里。这个强制性的措施只是暂时的,而且见效不大,因为在约公元350年,圣约翰·克里索斯托估计在城里还有10万左右穷人,可能他估计过高。同时,在4世纪,罗马帝国东部民不聊生,以致拜占庭国王不得不采取措施控制健全的穷人。定居本地的穷人都必须参加城市建设来“承担他们在人间的苦难”,由此“摆脱将他们引向犯罪的游手好闲的生活”<sup>①</sup>。而外来的穷人则被无情地排斥在外,被迫走上流浪之路。

而在西部,人们估计在罗马帝国末期的罗马城,受救济的人

<sup>①</sup> 配建(配) 编(编) 刊(刊) 究(究) 保(保) 社(社) 稿(稿) 老(老) 贵(贵) 员(员) 心(心) 愿(愿) 援(援)

数为 50 万左右，但在日耳曼人入侵帝国之后，农村首当其冲陷入苦难之中。梅斯、图尔或马赛仅有 5 万—10 万人口不等。源—苑世纪，残破的城墙包围下的城市犹如穿着过于宽松的衣服，重新回到农村状态，直到 10 世纪才开始有了真正的经济复苏。在达戈贝尔特统治时期，只有罗讷河谷地、索恩河谷地一线一直到墨兹河谷地还保留着一些商业活动。人丁稀少的城市与荒无人烟的农村遥相呼应。到 10 世纪，奥斯特拉西亚、勃艮第、纽斯特里亚和阿基坦这四个法兰克王国仅有 10 万—20 万不等的人口，这似乎已经达到了人口的最低限度。尽管人们历尽艰辛在皮卡第的森林、墨兹河谷地或是图卢兹的农村辟出一些耕地，收获的庄稼仍然不足播下的种子的两倍，很难维持当地人的生活。受这种不稳定性影响的农民、自由人、佃农或是奴隶不仅要养活自己，而且还要“供养他们的主人、士兵、教会人士，那些拥有土地并且命令、裁决、惩罚、剥削他们的人”<sup>①</sup>。

从那时起，极小的事件都会引起轩然大波。首先显然是周而复始的鼠疫等灾害（这个流行病在 591—598 年悄悄从罗讷河沟潜入并且一直持续到 7 世纪早期）、地方性战役以及随之而来的抢劫和杀戮。更平常些，恶劣的天气引起庄稼歉收、物价飞涨，或是春季的青黄不接将最脆弱的人群推向了高利贷者或者大路上，成群结队从一个城市流向另一个城市，随着施舍地点的变化而迁移。

为了遏止这一范围广泛的现象，597 年图尔公会鼓吹发放足够的物资来稳定流动的人群，但是建议的效果微乎其微<sup>②</sup>。面对越来越多的流浪人群，疲惫多疑的人们豢养起了看门狗来对付他

① 转引自 [德] 海因里希·施密特著，周树军译，《中世纪欧洲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100 页。

② 转引自 [德] 海因里希·施密特著，周树军译，《中世纪欧洲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100 页。

们 ,以致在 缘缘年 ,另一次公会 ,即马孔公会禁止主教们这种极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行为 ,因为这种行为使穷人打消了接近他们的念头。<sup>①</sup> 但 愿愿年巴黎公会用最激烈的言词所揭露的可能是那些高利贷者的态度 :

在饥荒时期 ,一个受贫困所逼的穷人去向高利贷者求助 ,尽管他知道得到的回答将会是 :“你要买东西 ,可以 ,付了账就可以把东西拿走了。”

对此穷人回答道 :“我没钱付账 ,求你可怜可怜我 ,无论如何 ,把我想要的东西借给我 ,使我不至于饿死。”

高利贷者反驳 :“你出多少钱我就卖你多少麦子 ;或者下一季收割时你把这些钱还给我 ,或者用小麦、酒或其他什么食物来抵债。”<sup>②</sup>

凭什么用收获时 猿摩<sup>③</sup>甚至是 源摩的东西去偿还饥荒时借的仅仅 员摩的东西 ?

但撇开中世纪早期人们所受的灾难不谈 ,除去对吉贝尔·德·诺让所称的“吞噬穷人”的高利贷者的揭露 ,传统的研究圣师著作的教学承认了穷人在城市中的地位 ,同时还提醒人们施舍的责任及其精神价值。然而 ,早在基督对年轻的富人说那番话时 ,穷人的概念就已显得模棱两可。“你若愿意做完全人 ,”基督对他说 ,“可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sup>④</sup>年轻人

① 同上页注释②。

② VI 精 粗 造 孽 罪 孽 愿 愿 精 粗 造 孽 罪 孽 XV 缘 愿 精 粗

③ 原文为 皂 皂 译 复 数 皂 皂 古 代 计 量 单 位。——译者注

④ 《马太福音》第 愿 篇 第 愿 句。所有《圣经》译文均参照中国基督教协会 愿 愿 年出版的《圣经》。——译者注

为了表达自己的谦恭,受到劝说后心甘情愿成为了穷人,显然不能将他同那些身不由己遭受贫穷的真正穷人相提并论。因为只有选择的贫穷才能成为一种美德,它使得路加能够严厉责备那些富人:“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sup>①</sup>

由此,身为猿缘年希波那主教的圣奥古斯丁认为被迫“成为穷人”,“没什么值得骄傲的”。至于猿员年任尼斯的主教的格列高利,他预言一种真正的“社会契约”<sup>②</sup>——这种说法惊人地现代——将通过施舍将穷人与富人联系起来,如此,使后者取得“通往天国的保障”。这两个人起源于同一块泥土,共同生活在拥有世间财富的社会中,按格拉蒂安的名言,“根据自然法则,所有财富都是公有的”。只要不考虑人性的狡猾,原始时期的丰富物品其实一直存在着,这一时期因为土地倾力产出而被奥维德称为“黄金时代”。“如果每个人,”圣巴西勒断言道,“各取所需,并将‘剩余物’资分给穷人,那么贫富将不复存在。”<sup>③</sup>而猿源年的主教米兰的安布鲁瓦兹则坚持道:

不管富人穷人,土地是所有人的公共财产。你们这些富人,为什么独占财富?大自然并不认识你们这些富人,她把我们生下来时我们都是穷人。我们生来就是同一类人。<sup>④</sup>

① 《路加福音》,第 远篇,第 圆原—圆缘句。——译者注

② 乞食乞食(乞食)和施舍(施舍)是早期基督教社会财富分配和土地分配原则,圣奥古斯丁和格列高利都强调这一点,认为这是实现社会正义和公共财产的关键。

③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 猿卷,第 猿章,第 猿节,第 猿段,译者注。

④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 猿卷,第 猿章,第 猿节,第 猿段,译者注。

但是这里指的并不是要消灭财富,更多的是要拒绝“屋连屋”“田并田”的囤积居奇,并且要求平分所有财产。这种态度并不罕见,14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在他的《神学大全》一书中斩钉截铁地指出:“根据自然法则,某些人所拥有的大量财富来源于穷人的食粮。”<sup>①</sup>只有将剩余物资再度分配,富人才能保证财产的合法性;契约应该和谐地把富人同穷人拉到一起,一个通过他的无私,另一个通过他的耐心,两人同时找到获救的道路。

这种施舍的义务在中世纪早期一直没有停止过。主教们——穷人“真正的父亲”,他们不仅要像1263年奥尔良公会强调的那样贡献教会收入的四分之一以满足穷人的需要,而且还要严格管理上帝赐予人类的财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伤害那些理应受益的人,即穷苦的人。

但是,尽管每个信徒都应行善以“熄灭罪恶”,从源世纪起,人们开始通过注册的方法来组织这种救济活动。这可能受到了埃及什一税的启发,即将当地收获的十分之一分给穷人。不考虑当时使用的种种称呼,第一批注册被证实出现在源6年前的兰斯,然后在约源6年出现在拉昂,到远世纪这种注册体系有了真正广泛的应用。在苑世纪中期的梅斯,城里和附近的教堂共登记穷人苑6人,但都是些官方的穷人,即受救济的穷人的数目是一定的、有限的。<sup>②</sup>在加洛林王朝时期,教会注册的礼拜功能超越了其社会功能,为了象征十二使徒,每次被救济的穷人通常是十二人。这当然既不能反映不幸的深度,也不能反映其多样性。这些登记过的人,他们有特权享受教堂制度化的保护。

从那时起,设立在过往行人最多的大路旁的教会收容所接替

① 栽老非皆译批,译批,栽老非皆译批卷II,源远苑,栽老非皆译批

② 栽老非皆译批,译批,栽老非皆译批卷II,源远苑,栽老非皆译批

